

陈宝箴和湖南新政

刘梦溪 著

故宫出版社

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

陳寅恪



NLIC2970860658

咸豐之世，先祖亦應進士舉，居京師。親見圓明園千霄之火痛哭南歸。其後治軍治民，益知中國舊法之不可不變。後交湘陰郭筠仙侍郎嵩燾，極相傾服，許為孤忠閎識。先君亦從郭公論文論學。而郭公者，亦頌美焉。當時士大

陈宝箴和湖南新政

刘梦溪 著



NLIC2970860668

故宫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陈宝箴和湖南新政 / 刘梦溪著. — 北京 : 故宫出版社, 2012.7

ISBN 978-7-5134-0271-2

I. ①陈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陈宝箴 (1831~1900) — 人物研究②湖南省 — 地方史 — 史料 — 清后期 IV. ①K827=52②K29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123716号

陈宝箴和湖南新政

著 者: 刘梦溪

责任编辑: 李文君

装帧设计: 李 猛

出版发行: 故宫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: 100009

电话: 010-85007808 010-85007816 传真: 010-65129479

网址: www.culturefc.cn 邮箱: ggcb@culturefc.cn

印 刷: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: 21.25

字 数: 170千字

版 次: 2012年7月第1版

2012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~5,000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4-0271-2

定 价: 48.00元

陈宝箴和湖南新政

刘梦溪 著



NLIC2970860668

故宫出版社

目录

自序 / 4

第一章 陈宝箴和同光胜流及其所扮演之角色 / 11

第二章 陈宝箴抚湘之胆魄与改革思路 / 27

第三章 湖南新政的喉舌《湘学报》和《湘报》 / 51

第四章 蜚声中外的湖南时务学堂 / 63

第五章 南学会之成立与兴民权 / 87

第六章 仿西而有中国特色的保卫局 / 115

第七章 湖南新政在戊戌之年的机遇与挫折 / 131

第八章 戊戌政变和湖南新政的失败 / 213

第九章 陈宝箴之死的谜团及求解 / 245

后记 / 337

自序

余治义宁之学二十有年，专书尚未问世，不免为君子所窃笑。然片段心得、专篇著论，亦多有见诸书刊文字者。尝谓寅老郁寓心灵深处之沉哀剧痛，实由于一生遭遇巨变奇劫之不寻常记忆，而尤以戊戌之年变政与政变所给予之刺激最难忘怀。故 1945 年为吴其昌氏《梁启超传》所撰之“书后”，力辩清季之变法“有不同之二源，未可混一论之”。其词曰：

咸丰之世，先祖亦应进士举，居京师。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，痛哭南归。其后治军治民，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。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，极相倾服，许为孤忠闳识。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。而郭公者，亦颂美西法，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，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

也。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，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，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之法者，本自不同。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《无邪堂答问》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，深以为然。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，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。¹

盖寅恪先生所辩者，为其祖父陈宝箴和父尊陈三立所主张之变法，乃“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之法者”，而非康有为氏倡言疾行之深涵托古改制意味之变法。两者之不同，为一渐进，一激进。康梁领军之戊戌变法之失败，实系激进变法思想之失败，故为持渐进变法主张之义宁父子所痛心疾首。

察之近现代中国之史乘，戊戌之后之社会与文化变迁，颇有似于激进之层累堆积。解者不乏洋务之失在未变法，变法之失在未革命之悖议。故寅老于此吴传后序之结尾处不禁痛乎言之：“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，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，民生之荣悴，则知五十年来，如车轮之逆转，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。是以论学论治，迥异时流，而迫于时势，噤不得发。”又曰：“因读此传，略书数语，付稚女美延藏之。美延当知乃翁此时悲往事，思来者，

其忧伤苦痛，不仅如陆务观所云，以元祐党家话贞元朝士之感而已。”²

南宋大诗人陆游之祖父陆佃亦北宋名臣，早年尝受经于荆公（王安石）门下，但于安石所推行之熙宁变法未尽应声附和，后司马光“元祐更化”，仍列陆佃入元祐党人碑。安石逝陆佃又率诸生前往“哭而祭之”。其于朝政势力分野之无所向背之德范，颇似义宁父子在晚清新旧党争中所处之位置。陈三立岂不言乎：“府君独知时变所当为而已，不复较孰为新旧，尤无所谓新党旧党之见。”³故寅老忆及家世，每以放翁自比。1927年撰《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》其中有“元祐党家惭陆子”⁴之句。1958年作康有为百岁生日献词，又发慨叹：“元祐党家犹有种，平泉树石已无根。”⁵然则寅老所“悲”之“往事”，多为乃祖乃父与戊戌变法及政变之关系者，其“忧伤苦痛”可想而知。

越二十年后之1965年，晚年之寅恪先生在极端困难的情境下，又以衰病之躯，书写平生唯一之一部家世自传《寒柳堂记梦未定稿》，特辟专章记述“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系”，再次申明：“盖先祖以为中国之大，非一时能悉改变，故欲先以湘省为全国之模楷，至若全国改革，则必以中央政府为领导。当时中央政权实属于那拉后，如那拉后不欲

变更旧制，光绪帝既无权力，更激起母子间之冲突，大局遂不可收拾矣。”⁶要之，即强调陈宝箴、陈三立所主张之变革为稳健渐进之变革，而非激进式变革。戊戌变法遭遇政变之悲剧，乃操持过切之激进变革之悲剧，为乃祖乃父亦为寅老本人深所不取也。所谓“儿郎涑水空文藻，家国沅湘总泪流”，所谓“衰泪已因家国尽，人亡学废更如何”，其意其情，其哀其痛，倘在斯乎？倘在斯乎？

因此笔者将陈寅恪先生流露于诗文著述中的此一深层之“哀伤”与“记忆”，视为解开其精神世界牢愁忧结的一把钥匙。而1965年之陈诗《乙巳冬日读〈清史（稿）·后妃传〉有感于珍妃事为赋一律》⁷，已将此一深层牢结概括无遗，其中“家国旧情迷纸上，兴亡遗恨照灯前”之诗句，不啻寅老一生之心路历程并全部著述之主题词。职是之故，笔者于十余年前，经过长时间搜罗爬梳，写就七万言之《陈宝箴和湖南新政》长文，作为陈寅恪研究专书之一章，试刊于2002年出版之《中国文化》杂志。2009年中国文化研究所发行学报，复经校勘增补至十万字，收入中华书局出版之《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》第一卷。因缘得睹此篇之学界友人，无不以为应单独印行以飨同好云。

盖陈寅恪先生祖父陈宝箴一生之业绩，要以1895年至

1898年担任湖南巡抚期间，经其子陈三立之襄助，所推动之湘省改革功勋最著。晚清改革派人士梁启超、谭嗣同、黄遵宪、熊希龄、江标、徐仁铸、皮锡瑞、唐才常等，因父宁父子之大义感召，一时间齐集湖南。董吏治，辟利源，变士习，创办《湘学报》和《湘报》，开办时务学堂，成立南学会，设立保卫局和课吏馆，又拟选派一批留学生赴日，“其士绅负才有志意者，复慷慨奋发，迭起相应和，风气几大变”⁸。但湖南既是改革势力最能发挥的地方，亦是保守势力抵制最顽强的地方。王先谦、叶德辉为代表之反对变革前行之势力，同样极波澜壮阔之盛。故1898年之戊戌变法以湖南为先行典范，同年八月慈禧政变也以湖南所受打击最为沉重。陈宝箴、陈三立父子分别以“滥保匪人”和“招引奸邪”之罪名，被革职永不叙用，他们的“营一隅为天下倡，立富强根基，足备非常之变，亦使国家他日有所凭恃”⁹之理想化为泡影。谭嗣同等“六君子”惨遭杀害于京城菜市口，康梁外逃而幸免于难。黄遵宪、熊希龄、徐仁铸、皮锡瑞等其余湘省改革人士一例遭受惩处。王先谦、叶德辉诸人则弹冠相庆，王赞叶有摧陷廓清之功，叶许王有力挽狂澜之力。湖南新政在戊戌八月后之凋零景象，有让人潸然泪下而不忍卒观者。

余之所专攻并非乙部之学，因悉心义宁而稍涉晚清史事。故本书之固陋疏误之处，尚祈专门治史之博雅君子多多是正。已往之戊戌变法史研究，不乏及于湘省改革之闳论巨篇，然多以梁（启超）、谭（嗣同）、熊（希龄）、唐（才常）、樊（锥）、毕（永年）等为案例，鲜有从新政的领导者义宁父子之角度据以钩沉研究者。如果此书可从此一侧面补苴罅漏于万一，则幸莫大焉。至于取材运笔之角度，则通过详细梳理甄别所能见及的历史资料，尽量“回到现场”，试图重构当时的人物、事件和故事之互相交错之历史图景。

今恰值辛亥首义一百周年，戊戌之难已过去百有一十二载矣。谨以此书献给变革未竟之 21 世纪之中国。

2010 年 11 月 9 日于京城之东塾

2011 年 9 月 13 日复经校核润改

注释

1 陈寅恪：《读吴其昌梁启超传书后》，《寒柳堂集》，三联书店，2001年，第167页。

2 同上，第168页。

3 陈三立：《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》，《散原精舍文集》卷五，又见《散原精舍诗文集》（李开军校点），下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855页。

4 陈寅恪：《诗集》，三联书店，2001年，第17页。

5 陈寅恪：《南海世丈百岁生日献词》，《诗集》，三联书店，2001年，第130页。

6 陈寅恪：《寒柳堂集》，三联书店，2001年，第203页。

7 陈寅恪：《乙巳冬日读〈清史（稿）·后妃传〉有感于珍妃事为赋一律》，《诗集》，三联书店，2001年，第172页。

8 陈三立：《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》，《散原精舍诗文集》（李开军校点），下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854页。

9 同上，第852页。

第一章

陈宝箴和同光胜流及其 所扮演之角色

如果就个人情感的好恶而言，我对清代二百六十几年的统治实在没有太多的好感。包括史家所艳称的“康乾盛世”，总觉得需要打折扣的地方很多。至于那些显赫的所谓“文治武功”的治绩，在接连一百二十八年的文字狱（自顺治十七年庄廷钺修《明史》案，到乾隆五十三年贺世盛的《笃国策》案）面前，显得黯然失色。所以嘉、道以后走下坡路，早在那“盛世”便埋下了种子。特别到了咸丰、同治年间，国家状况濒临不可收拾的地步，自己家里天灾人祸不说，“四夷”列强又高调叫阵，长期关闭的国门，被西人的船坚炮利硬行打开。纵使汉武、唐宗再世，玄烨、弘历临朝，恐怕也要因应失据，不知谁可。

不过令我们感到惊异的是，当时的状况虽然越来越坏，却出现了一大批个性色彩鲜明、敢于担当、学养深厚、可称作箭垛式的人物。这些人物尽管党有新旧、流分清浊、物论匪一，而且都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，最终也没有因为他们的努力而挽救清朝的颓运，但均为一时之选，同为当时胜流，作为历史人物各有其可圈点可记录之处，应无问题。一代大史学家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、父亲陈三立，就是这一人物谱系中的佼佼者。研究义宁之学，不能不翻阅清季胜流的人物档案。

清季胜流人物的第一把交椅，非曾国藩莫属。实际上，当时的人物谱系，都是以这位曾湘乡为网络中心的。胡林翼、李鸿章、左宗棠、郭嵩焘、俞樾、王闿运、薛福成、吴汝纶、刘蓉，哪一个与湘军幕府分得开。朝廷因循腐败，无力阻遏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，各地豪杰之士起而组织团练即地方军，参与平抑太平军的战斗。结果无意中开辟了招纳并造就人才的新途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聚拢在曾国藩周围的并不是地方豪强，大部分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¹。陈宝箴的崭露头角，也是由于和曾国藩的交往。

陈宝箴，一名观善，字右铭，道光十一年（1831年）生于江西修水县之竹垞乡。其先世居闽，曾祖腾远始迁赣。祖克绳，父伟琳，以行医兴教闻名乡里。咸丰元年（1851年）恩科乡试，宝箴成为举人。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，入京会试，没有考中，留京师三年，有了结交各方面隽异方雅之士的机会，而尤与奉新易佩绅、武宁罗亨奎相契合，因而有“三君子”之目²。后来易、罗南下带领湘军与太平军作战，陈宝箴先回江西看望母亲，然后抵湖南，参与在凤龙山一带与石达开部的作战，守城累月，军粮将尽。这时右铭到澧州、永顺为之筹饷。虽遇风雪，仍穿很单薄的衣服，永顺守张公修府见此情景，慌忙拿来狐皮大衣给宝箴披上，宝箴不受，

说：“军士已经冻饿很久了，我怎能忍心自己取暖？”张公感动得涕泗横流，立即征召民众，拿出银米交付，使易、罗率领的“果健营”及时得到后勤保障，屡建战功，名声大振于东南之地³。

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也就是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，三十二岁的陈宝箴拜访了驻扎在安庆的曾国藩。在陈宝箴心目中，曾国藩不啻命世伟人；而曾国藩一见宝箴，便叹为“海内奇士”⁴，立即尊为上宾。曾的幕僚则争相交欢引重，李鸿裔甚至提出由陈宝箴接替其幕僚主管的职务。但陈宝箴喜欢直接的军事运作，没有留在曾幕任职，而是到席宝田主持的江西军道参与谋划。当时江西闹饥荒，灾民遍野，虽有赈灾之举，不过虚应故事。宝箴见此情景非常难过，于是写信给江西巡抚沈葆楨，痛陈彭泽、鄱阳县境“田庐榛莽，墟落萧条，雀无罗之可张，草掘根而亦尽”的破败景象，向其建言：“赈而不能活，犹不赈也；活而不能久，犹不活也。”⁵沈公感悟其道理明通，于是从府库中拿出钱米，大举进行赈灾活动，百姓因而得救纾困。沈葆楨是福建人，比陈宝箴大十一岁，道光丁未（1847年）进士，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，为人颇具性格，受林则徐的影响，为中国的自强奋斗了一生，也是晚清胜流中的重要人物。沈欣赏右铭的才干，遇到